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賴和漢詩的新思想及其寫作特色

doi:10.7013/CCTHCWHSNK.199903.0151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2), 1999

作者/Author：施懿琳

頁數/Page：151-18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9/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13/CCTHCWHSNK.199903.015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賴和漢詩^(註一)的新思想及其寫作特色

施懿琳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前言

賴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彰化市人，筆名有：懶雲、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等。少時曾習漢文，十歲時入小逸堂接受黃倬其的指導，奠定下相當深厚的古文基礎。一九〇九年考上台北醫學校，一九一四年畢業後至嘉義實習，因不滿日人的差別待遇，憤而離開。一九一七年返回彰化自行開設「賴和醫院」，一九一八年二月前往廈門鼓浪嶼的博愛醫院任職，一九一九年七月返台(註二)。一九二一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並當選為理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因「治警事件」(註三)第一次入獄，次年一月獲不起訴處分，出獄後留鬚

註 一：所謂「漢詩」乃指日治時期傳統詩人所寫的舊詩而言，亦可稱為「傳統詩」或「舊體詩」。

註 二：過去對賴和前往廈門的時間一直無法確定，直至一九九四年林瑞明發表〈賴和漢詩初探〉一文，始據天理大學教授下村作次郎寄贈中村孝志生前所藏《廈門博愛醫院滿五週年紀念誌》影本資料考查得知，賴和確定的任職、退職記錄。這個時間的考定，對理解賴和與中國五四運動的關係頗具重要性。參考林瑞明該文，「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所宣讀之論文，清華大學，新竹，一九九四年，四一頁。

註 三：治警事件之始末，可參考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第二章，學海出版社，台北，一九七九年初版。

以為紀念，並益堅定其抗日意識。一九二九年二月與陳虛谷、楊笑儂等人成立「流連思索俱樂部」，此實一九三九年賴和與彰化友人所創設的傳統詩社——彰化「應社」之前身。一九二五年發表第一篇白話隨筆〈無題〉，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發表第一首白話詩〈覺悟下的犧牲〉，一九二六年一月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鬥鬧熱〉，此後積極投入新文學創作，並努力提攜年輕一輩的創作者，成為台灣新文學發展重要的主導人物。一九三一年擔任《台灣新民報》顧問兼學藝部編輯，一九三六年一月發表〈赴了春宴回來〉之後終止其新文學之創作，轉而繼續以舊詩表達對殖民者的抗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之時，再度入獄，約五十日，撰有《獄中日記》並有多首〈獄中詩〉備見其晚年心境。一九四三年一月卅一日因心臟病過世，享年五十歲。主要小說有〈鬥鬧熱〉(1926.1)、〈一桿稱仔〉(1926.2)、〈不如意的過年〉(1928.1)、〈蛇先生〉(1930.1)、〈雕骨董〉(1931.5)、〈歸家〉(1932.1)、〈豐作〉(1932.1)、〈惹事〉(1932.1)、〈善訟人的故事〉(1934.12)、〈一個同志的批信〉(1935.12)、〈赴了春宴回來〉(1936.1)；新詩則以〈覺悟下的犧牲〉(1925.12)、〈流離曲〉(1930.9)、〈農民謠〉(1931.1)、〈南國哀歌〉(1931.4)最具代表性。其它還有隨筆散文：〈無題〉(1925.8)、〈讀台日紙的新舊文學之比較〉(1926.1)、〈僅覆某老先生〉(1926.3)、〈希望我們的喇叭手吹奏激勵民眾的進行曲〉(1931.1)……等篇。至於創作時間最久的漢詩，據統計目留存有一千多首(註四)作品。

歷來有關賴和新文學方面的研究，已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成果(註五)；當

註 四：賴和生前出版的漢詩，僅見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黃洪炎編輯的《瀛海詩集》，共有十四首。一九七〇年應社出版《應社詩薈》輯錄賴和的〈懶雲詩存〉共九十三首。一九七九年三月李南衡主編《賴和先生全集》除〈懶雲詩存〉外，又補錄了《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文學》所刊載的賴和漢詩。一九九四年林瑞明在賴和家屬的協助之下，蒐羅了多首賴和未發表的手稿，據統計，包括不同抄本的漢詩作品，約有千首之多，而這些作品為紀念賴和百年誕辰，初步選取已可辨識者出版為《賴和漢詩初編》，至於更進一步細緻的整理、目前已經林瑞明詳為辨識，並收入將由前衛出版社出版的《賴和全集》中。

註 五：有關賴和的研究，以成大歷史系林瑞明的研究最為深入，相關著作主要收錄於《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文集》，允晨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其它相關研究可參考賴和紀念館

今，研究者已逐漸從新文學轉而進一步探討賴和漢詩的相關問題(註六)，嘗試去了解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作家的另一個寫作面向。本文不擬在此討論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只就個人近來思索的「跨越新舊文學的台灣作家之漢詩研究」此一主題，選擇當時最重要的作家——賴和作為對象，來進行分析探討。本文以賴和的手稿及已出版的《賴和漢詩初編》(註七)作為基本材料，嘗試透過詩作的逐首閱讀，了解目前留存有一千多首漢詩的「台灣新文學之父」，其漢詩在思想主題及寫作特色上有何異於前代詩人之處？同時與他自己的新文學作品有著甚麼樣互動的關係？在台灣文學史上這代表了甚麼樣的意義？具有甚麼樣的價值？

二、舊形式所呈現的新思想

綜觀賴和作品，我們可以提煉出一個整體性的思想貫串其中，此即——以「人」為主體的思考。不管是消極地抒吐被殖民者的悲哀，或是積極地抗議殖民者的不義，乃至批評社會的不公，賴和的著眼點都是在對於「人」存在尊嚴的確立上。這種「人本思想」，本無關乎新舊，但是，吾人若將之落實到二十世紀初，以殖民地台灣當時的處境來思考，或許可以在此思想基點上引申出異於前代詩人之處，而提出具有新意的特質來。

編，《賴和研究資料匯編》(上)(下)，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彰化，一九九四年六月；李篤恭編《磧溪一完人》，前衛出版社，台北，一九九四年。

註六：參考林瑞明〈賴和漢詩初探〉，同註二；李瑞騰〈賴和文學最初的面貌——賴和舊體詩考察之一〉，「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宣讀論文，清華大學，新竹，一九九四年；陳萬益〈賴和舊詩的時代精神〉，收在《種子落地》，彰化，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賴和文教基金會；陳萬益〈從民間來到民間去——賴和的文學立場〉，收在《中國文學史暨文學批評研討會論文集》，政大中文系出版，台北，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薛順雄的〈賴和舊俗文學作品的時代意義〉，收在《台灣文學中的歷史經驗》，文津出版社台北，一九九七年六月；廖振富的〈林幼春、賴和與台灣文學〉，《文學台灣》，十七期，一九九六年一月。

註七：賴和的手稿目前收存在賴和紀念館；而《賴和漢詩初編》則由林瑞明選編，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彰化，一九九四年六月。

從賴和一生的行誼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謙沖柔和、溫厚內斂的人。雖然有清楚的理念與理想堅持，但是他行事並不激烈。誠如林瑞明所說的：「賴和並非政治性格強烈之人。他願意站在中間地帶，協助一切台灣文化向上，為台灣的政治權利而奮鬥。本身居名與否並不重要，此種性格在文協分裂後更可清楚地觀察出來」（註八）。一九二七年台灣左派勢力抬頭，文化協會產生分裂而由左派人物取得主導權時（註九），賴和仍然和諧地與各派勢力相處，這實緣於他溫和的處事態度；一九三五年當《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有著主張的不同而產生對立時（註十），賴和依舊與兩邊維持一定的友好關係。甚至當我們觀察目前可見的賴和與友人的團體照時，賴和往往是站在比較邊緣或不顯眼的地方，而極少坐在最中央居於主導者的位置，這代表著甚麼？因為尊重每一個生命獨立存在的尊嚴，因此賴和並不自以為偉大或重要，儘管在文學界、文化界已居舉足輕重的地位，他依然是謙和的。這種對「人」的尊重，是不分身份地位的，因此賴和在作品中不僅強調人的平等，更強烈地表達了對弱勢族群的深切關懷，這種關懷不是高高在上的矜憫，而是感同身受地與受難者站在同一條線上，替他們說出想說而說不出口的話。這種仁者襟懷在傳統文學中其實並不少見，那麼賴和可貴之處，或者說他具「新意」的特殊之處何在？筆者認為，主要在於他一生皆為被殖民者，對世局、社會、人性的思考，要比一般非殖民地知識份子來得深刻。加上二〇世紀初，受世界新思潮啟發，他更了解到人性尊嚴的可貴以及人本來就生而自由平等的事實，因此，他認為這世上不應該有種族歧視、階級壓迫。被壓迫者應該要有理性的自覺，為自己追尋

註 八：參考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收在氏著《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參考同註五，一五五頁。

註 九：有關文協的分裂，請參考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同註三，三三七至三四九頁。

註 十：一九二四年成立的台灣文藝聯盟為召集全島不同主張的創作者同聚於一堂，因此其創設宗旨沒有明確的特色。後來留日學生所組織的「福爾摩沙」成員加入後，逐漸導向「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觀，造成主張「為人生而藝術」的楊逵之不滿，遂退出該會，另創《台灣新文學》。

生命的價值，不應受傳統迷信思想所矇蔽，以致於崇拜神明、妄信地理風水；更不該紙醉金迷，昏昧懵懂地度日。在賴和漢詩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一方面正面歌頌自由、平等、理性、博愛的重要；一方面則對與之對反的負面存在如：強權的壓迫、階級的矛盾、思想的落後、行為的墮落……進行批判。在賴和諸多漢詩作品中，最能表現這些觀點的當推他一九二四年所寫的〈飲酒〉詩：

世間萬事皆縈心，悲哀歡樂遞相侵。生者勞勞死寂滅，豪門酒肉貧民血。愚民處苦久遂忘，紛紛觸眼皆堪傷。仰視俯蓄兩不足，淪作馬牛膺奇辱。我生不幸為俘囚，豈關種族他人優？弱肉久已恣強食，致使兩間平等失。正義由來本可憑，乾坤旋轉愧未能。眼前救死無長策，悲歌欲把頭顱擲。頭顱換得自由身，始是人間一個人。平生此外無他願，且自添衣更加飯。天道還形會有時，留取雙睛一看之……

賴和在詩中指出，自己所處的是一個面對殖民統治與階級壓迫的時代，因此，亟須追求：平等、正義、自由，做為「人」存在的基本條件。然而，在那異族統治的時代，「兩間」欲求平等，實有其困難。這裡所謂「兩間」，其實包括了：種族(漢 / 和)之間、階級(貧 / 富)之間，甚至可以推而廣之，凡所有「權力者」與「無權者」之間(如官 / 民、男 / 女)皆可歸屬之。「弱肉久已恣強食，致使兩間平等失。」，賴和認為由於強與弱的差異，使得原本應該平等對待的兩方失衡了，那麼，失去的自由、平等要如何爭取呢？「頭顱換得自由身，始是人間一個人」，唯有不惜一切代價，以生命、以行動、以全幅的心靈努力去抗議爭取，始可能獲致。這需要有智慧、有行動力、有寬廣視野的人始能勝任之。因此，在賴和漢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當代幾位「先覺」的景仰，也可以看到他對吸收世界新思潮的學子充滿了期待。他在〈申酉(註十一)〉

註十一：「申」、「酉」皆為地支，如此記年有誤，當是一九二一年「辛酉」才對，台語「申」、「辛」兩字音近，極可能賴和緣此誤記。

歲晚書懷>指出：「陳舊靈官今腐敗，掃除腦府待更新」(1921)，待誰來「去腐生新」呢？在<書答敏川先生>中賴和寫道：「方今社會無思想，專賴先生改造來」(1920)；在<送林獻堂之東京>則云：「愧我戀生甘受辱，多君先覺獨深憂。破除階級思平等，掙脫強權始自由」(1920)，這皆是對推行社會運動的前輩之推崇；而<弔在京遭難學生>：「玉石俱焚成浩劫，民權今後待誰張」(1923)的悲慟，<寄懷在東諸友>：「愧我寄生同贅物，憑君造福及吾民」(1920)的殷切，皆緣於對吸收新知的年輕世代具有高度的期許。當然，對於這個喚醒民眾從陰暗走向光明的文化啓蒙運動，賴和自是不落人後的，雖說自己「戀生受辱」、「寄生同贅物」，這其實皆是客謙之辭，我們看他在送給至交陳虛谷詩裡所說的：「同是世間一份子，肯教辜負有為身。生來職責居先覺，忍把艱難付後人？」(送虛谷之大陸.1923)，才真正吐露了他的心情。因為不肯辜負此生，因為不忍把艱難留給後人，因此，這些有良知、有正義感的台灣知識份子，必須嘔心瀝血，把他們的精神全付投入新思想的宣揚，並致力於台灣人存在尊嚴的追尋。這種宣揚與追尋，除了透過實際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來實踐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方式即透過「文學」的手法來表現，嘗試透過文字的傳播來洗滌或改造當時台灣民眾的思想。以下筆者嘗試經由歸納整理之後，分別從「被殖民地知識份子的省思」與「新思想的追求」兩個角度，說明賴和漢詩在主題上的特色。

(一)我生不幸為俘囚——殖民地知識份子的省思

日本統治時期，令台灣知識份子感到憂慮不滿的措施比比皆是，比如法律的不公平、制度的不完整、教育的匱缺、對漢文化的壓制……等等。但，總的說來這些不滿之所以產生，主要還是源於台灣乃一殖民地。作為被殖民者，許多基本人權都是被壓抑的；身份認同的問題也因為現實的困境而產生衝撞與撕裂。作為兩不著邊的台灣人，政治上的屬國--日本，將之視為二等國民；文化

上的母國—中國，不僅無法保護他，甚至自己也在軍閥征戰中，有著瀕臨割裂的危機。

台灣人究竟應該何去何從？對日本、對中國，乃至台灣本身，究竟該如何思考、如何定位？這些問題都可以在賴和詩中看到他的追問與思索。

1. 對日本的批判

相對於日治之初已接受多年傳統漢文教育的文人如：鹿港洪月樵、霧峰林幼春、傅錫祺等「一世文人」而言，賴和與其同時代作家如陳虛谷、楊守愚等人，皆屬於「二世文人」（註十二）；但是，若與自幼即接受日文教育，對傳統漢文化感到陌生的台灣作家如：呂赫若、龍瑛宗等人而言，賴和又屬於新文學作家裡的「前行代」。與賴和同世代的作家，因為曾經接受漢文薰陶之故，所以對漢文化有著難以割捨的依戀之情；但是又因為接受新思想的啓發，所思考的問題與作品呈現的面向要比「一世文人」來得寬廣而開闊。至於對日本殖民者的態度而言，「二世文人」雖然也接受日本教育，卻不似年輕世代因為自幼受到日本精神薰陶，對日本近代文明有著極深的崇慕之情（註十三）；再加上日本接收台灣之際的殘虐行為，猶在父老口中流傳，因此，我們看到「二世文人」在作品中對日本殖政者所抱持的態度多是抗議的、批判的，這可以在賴和的漢詩中透見端倪。

註十二：林莊生《懷樹又懷人》：「父親（筆者案：即莊遂性）同輩的好友，用北美慣用的稱呼來說，應屬日本統治下的『二世文人』，因為他們都出生在日本領台後……這種人多半是少年時期受過漢文教育，他們漢文雖不如『一世』，如洪棄生、傅錫祺、林幼春、林獻堂，但，足以作文議論，吟詩敘懷……」，自立報系，台北，一九九二年，二三八頁。

註十三：林瑞明認為二〇年代中期出發的第一代新文學作家如：賴和、陳虛谷、楊守愚等人，有著豐富的漢文涵養，同時又受完整的日文教育，因此能透過日文直接吸收世界文學的資源，只是他們在創作時不採用統治者的語言寫作而已。他們和三〇年代以日文創作的作家如：楊逵、龍瑛宗、張文環、巫永福、呂赫若等相當不一樣。第二代作家年紀較輕，較少傳統的包袱，更能接受日本文學，他們的文學素養主要是靠閱讀日本作品而來。至於第三代作家，如陳火泉、周金波、王昶雄等則在精神上、意識上受日本影響更大。參考氏著《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同註五，三二六、三二八、三六五頁。

賴和對日本政權的反抗意識，每多表現在他的新文學作品裡。著名的小說〈一桿秤仔〉(1926)、〈不如意的過年〉(1928)、〈惹事〉(1932)等篇；著名的新詩〈覺悟下的犧牲〉(1925)、〈流離曲〉(1930)、〈南國哀歌〉(1931)等，所表現出來激烈的抗議精神，前人多已論及。其實在他的漢詩作品裡並不缺乏對日本當局的批判，而這種批判精神主要表現在對日本帝國主義、財政措施、警察制度、教育方針的不滿之上，以下試為說明之。

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對台灣最大的影響，始於甲午之戰後的乙未割台。賴和生於一八九四年，恰值割台的前一年；他的出生地彰化，在當年就是對日武裝抗爭中一個極重要的戰場(註十四)。因此，在賴和許多憑吊故鄉古蹟的作品中，常可見他對於當年「八卦山之役」的追懷，對於因為戰爭的失利，導致淪為被殖民者的悲恨。比如他的〈讀台灣通史十首〉之六：「黑旗風捲卦山巔，善戰才堪當一邊。留有昔年遺老在，男兒猶共說彭年」(1920)，憑弔的是八卦山之役中壯烈犧牲的黑旗將領吳彭年(註十五)。藉由耆老之口，賴和諳知了當年戰況的慘烈，而以看似平靜之筆，將這位台灣史上的英烈之士紀錄了下來，事實上詩中乃暗藏著作者對反抗日本英雄的深深禮讚。至於他「藉弔古以傷今」的〈定寨〉詩，則更明顯地表現了作為被殖民者的痛苦和悲哀：「山河歷歷新，世代悠悠易。先民流血處，千載土猶赤。蒼茫俯仰間，禾油漫阡陌。天地自開曠，世間何迫仄？欲作天地遊，共誰借羽翼。墜地生為人，悲傷多惶惑。前途障礙地，努力披荊棘。」(1924)這種世間逼仄，無處可棲的傷痛，緣何而生？假如不是因為殖民者的殘酷壓制，怎麼會有「有懷強自祕，未敢輕太息」(定寨)的無奈？值得注意的是，在賴和作品中，我們常

註十四：彰化是台灣的古戰場，乾隆年間，林爽文、陳周全起事時的決戰地在此；日本領台之初，也會在八卦山發生過激戰，日本在此受創甚巨，對彰化人甚為反感，故在當時稱之為「惡化市」，參考筆者〈從應社詩薈看日據中晚期彰化詩人的時代關懷〉，《中國學術年刊》，十四期，一九九三年三月，頁二。

註十五：參考《台灣通史》〈吳彭年傳〉，眾文出版社，台北，一九七九年五月再版。

可看到他對土地所懷抱的深摯情感。他不以科學的角度，將大地視為塵土、砂礫的累積，而能透過「歷史之眼」，看到先民在此流血、流汗，始滋養了這塊美麗之島。緣此，努力為這塊土地打拼，是他一生所企求的主要目標。

日本軍人勢力的囂張，帝國主義的昌熾，尤其表現在三、四〇年代。一九三一年向中國挑引起「九一八事變」，雖然得以遂其擴張疆土的野心，但是，這要犧牲多少人的性命才能達成？緣此，賴和有〈日本軍〉詩：「奮身血戰據遼東，贏得人矜武士風。塞上幾多鄉國恨，都消萬歲一聲中。」這首詩仍是以平靜之筆，勾勒了人間慘事。佔據中國的東北，事實是投擲了無數軍人的熱血才得以成功的。一般人都只眩惑於輝煌的戰果，但是，這背後有多少無辜生命的犧牲，卻無人去關照；有多少戰士充滿著家國之思？也無人去在意。尤其進入日本統治晚期，軍國主義的狂潮，衝擊著日本人已激狂的心，只要能高呼「萬歲」，建立戰功，所有的辛勞，所有的犧牲，都可以全盤忘記。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快速地進攻泰國、緬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舉國進入了總體戰的瘋狂境地。而在「珍珠港事變」後立即被拘捕的賴和（註十六），則在獄中寫了這樣的一首詩：「忽聞街上有遊行，說是軍人要出征。好把共榮圈建設，安全保護我東瀛。」（忽聞），假如把這詩看成是賴和歌頌日本推行「大東亞共榮圈」（註十七）的理想，恐是一大誤解。應該注意的是他最後一句的反諷義涵：「安全保護我東瀛」，這樣大規模地征調人民出征，真是要保家衛國嗎？其實是日本軍人的嗜血黷武，導致無數壯丁成了砲火下的冤魂罷了！

註十六：參考賴恆顏、李南衡合編〈賴和先生年表簡編〉，收在《賴和研究資料匯編》（下），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彰化，一九九四年六月，五六九頁。

註十七：「大東亞共榮圈」這名詞最早出現在一九四〇年七月，日本近衛文磨第二次組閣時，當時擔任外相的松岡洋石就任後表明今後的外交方針，將本著日本的皇道精神，首先以日本、滿州、中國為一環，再確立大東亞共榮圈。台灣被規劃為當時南進至東南亞及太平洋各大島的據點，進而成為共榮圈的中心。參考廖慶洲《日本過台灣》，上硯出版社，台北，一九九三年十月，二三八至二三九頁。

除軍國主義外，對日本官方種種措施的反感，同樣在賴和的漢詩作品裡，有著一定程度的反映。〈郊行雜詩〉之七的「四野歡聲米價廉，家家豐樂足油鹽。傳來一事皆愁恐，搾蔗工場欲再添」(1919)，批評了以經濟作物——甘蔗取代稻作，給農民帶來的擔憂。至於〈郊行雜詩〉之八的「收得蕃薯已換鹽，社前豚價尚低廉。粟青賤賣未完稅，生怕官廳督促嚴。」以及一九二四年所寫的著名的〈吾民〉詩：「剝盡膏脂更摘心，身雖苦痛敢呻吟？忍飢糶米乾完稅，負病驚寒尚典衾。」則表達了對官方課稅之急切嚴苛的不滿。日治時期最令人感到莫大壓力的是警察制度的施行，使得台人無時無刻不處在被密密監控的網羅中(註十八)¹⁸。不僅日本警察耀武揚威，連台灣人所擔任的「巡查補」，也假託日本勢力欺壓自己同胞。賴和曾於〈無聊的回憶〉(1928)一文中談到：

那時代的補大人，多是無賴，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橫行直撞，為大家所側目。說起大人，簡直就是橫逆罪惡的標本，少(稍)知自愛的人皆不願為。

他爲人所琅琅上口的〈偶成〉詩(1924)，便是譏諷這類「三腳仔」的可恨：

一自揚名後，非同草野身。用刑還及母，執法竟無親。時日亡及汝，威風代有人。清如風過袖，到底不憂貧。

飽飯閒尋事，貪功每陷人。心同鷹隼驚，性比犬羊馴。以我同胞血，沽他異樣恩。不知民可貴，但畏長官尊。

一旦躋身有權者之行列，這些得志的小人便搖身一變，轉過來欺壓自己的同胞，甚至連至親之人亦不放過。爲建立事功而污陷台人，爲表現自己的威勢而

註十八：參考黃昭堂《台灣總督府》，前衛出版社，台北，一九九四年四月，二二九至二三〇頁。

用刑於同胞，這種狠毒的心腸，實可與鷹隼相類比。至於，當他面對日本長官時，卻又伏首貼耳，馴若犬羊。賴和此詩原題〈補大人〉，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將輕賤台民、逢迎日吏者的嘴臉毫不掩蔽地揭露。一九二七年他更以小說的方式寫成同題的〈補大人〉，將巡查補的形貌做更深刻的描述。賴和一生曾兩度入獄，深諳日本警察之可怕，作為一個被殖民的知識份子，除了嘗試以較隱微的文學手法來表達自己的抗議意識，實在很難有可發揮的空間。

除了警察勢力深入民間，牢牢地監控台民外，另一個更可怕的方式就是透過「教育」來洗腦。治台之初，尚無殖民經驗的日本當局，曾就台灣的教育目標究竟如何，做過討論。總督府當局及部份日本學者考察列強殖民地的情形後，覺知「教育殖民地人民是危險的」，因為接受新教育的殖民地精英常常在見識逐漸開闊以後，反過來與統治當局有所摩擦，普遍具有反對思想，比如印度的反英、菲律賓的反美皆然（註十九）。因此，日本當局認為台灣民眾在受教育的年限和內容上都必須有所限制。在教育的内容方面，努力強調大和民族的優越性與漢民族的劣根性，以造成「彼優我劣」的誤解。使台灣人感到自己是「清國奴」，是屬於弱勢的、貪生怕死的民族，與優秀的大和民族比較起來，漢人應該自慚形穢。這樣扭曲事實的教育，容易使得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學生在價值判斷、國族認同上產生了偏差，被殖民者的悲哀莫甚於此。雖然賴和並沒有刻意去探討這個問題，但我們仍可以在漢詩作品中看到他對當時教育的不滿。第一，它養成台灣學子馴從威勢的習慣。在〈大竹圍〉詩裡，賴和寫到「途逢警察知行禮，教育而今效果多」（1922），公學校放學的學生，看到警察，便知恭敬的行禮，這是打從心裡尊敬之故嗎？台灣人對警察的痛恨畏怕，已敘述如前。賴和指出孩童之所以恭敬警察，其實是「教育」灌輸的觀念使然。如此養成台人馴服的現象，賴和在〈讀台灣通史十首〉之十（1920），有著

註十九：參考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正中書局，台北，一九九二年七月，九七至九八頁。

極明顯的批評：

男兒志氣恥偷生，意到難平賭命爭。先覺遺模猶在目，後人見義只心驚。（昔台之民以反抗政府著稱，今日以服從見賞，何今昔之不同如此，亦教育之收效否乎？）

在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推行下，台灣年輕一輩被馴化了，更令人遺憾的是部份台人在這樣的情境之下，竟養成了歌功頌德的惡習。「種花蒔菜復手工，由來嬉戲稱兒童。吾台教育方針異，爭得人間競頌功。」（贈長井公學校長之三，1921），至於部份有良知的日本人如長井公學校校長，「主張育英排眾議，不知毀謗已叢生」（同前之四），則是在努力為台灣爭取合理的教育制度後，遭到眾人無情的詆毀、排擠。這是一個正義難伸，公理不張，君子道消，小人猖獗的時代。作為殖民地的社會精英，賴和如何思考自己的處境？如何尋找台灣的未來呢？

2. 對中國的失望

一九一八年春天，帶著濃厚民族情感的賴和離開彰化，前往廈門的博愛醫院就職。賴和去、來廈門之故何在？目前尚未獲得具體明確的資料來加以說明。不過，吾人仍可從他漢詩作品裡，看到這次中國之行的經驗。我們先逆著看，賴和在一九一九年從廈門返台所寫的一首長詩〈歸去來〉，抒發了他中國之行的總體感受：

…擾擾中原方失鹿，未能一騎共馳逐。歐風美雨號文明，此身骯髒未由沐。
雄心鬱勃日無聊，坐羨交交鶯出谷。十年願望一朝償，塞翁所得原非福。
渡海聲名憶去年，春風美酒滿離筵。此行未是平生志，誤惹傍人豔羨仙。
酬世自知才幹拙，思鄉長為別情牽。一身淪落歸來日，松菊荒蕪世亦遷。
詩壇寂寞嘯霞死，風流太守長致仕。市人趨利日奔馳，故舊成金多得意。

鏡前自顧形影慚，出門總覺羞知己。飽來抱膝發狂吟，篋底殘篇閒自理。

從「此行未是平生志，誤惹傍人豔羨仙。」可知賴和此行是矢志而歸的，去年春天啓程時，有多少人祝賀，有多少人羨慕，但是，真正到了一向慕戀的祖國呢？「十年願望一朝償，塞翁所得原非福。」多年來的企盼而今竟落空了！這種落空、失望的心情，竟使賴和寫出激烈的詩句：「茫茫大陸遍瘡痍，蠱病方深正待醫。蠱豕直成真現像，睡獅猶是好名詞……」（同七律八首之四，1918）人稱中國是「東亞睡獅」，賴和認為這還是褒揚之詞，如果依他親眼所見，倒不如用「蠱豕」來描述更為貼切！假如不是因為過高的期望，不是因為過熱的情感，溫和的賴和不會如此強烈地批評、痛斥自己的文化母國的。「故國相思三下淚，天涯淪落一庸醫。此行祇為虛名誤，失腳誰能早日知？……」（得敏川先生書及詩以此上復，約 1920），廈門之行，使他認識了原本企慕的、遙遠的祖國真實的狀況，也痛思這次前去是一個無法彌補的失誤。

那麼，當時的中國究竟是如何？竟令賴和如此傷心失望呢？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原應是中國新興勢力將做大翻轉的時期，一九一七年陳獨秀、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已開始逐步推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更是中國知識青年要求啓蒙救亡的關鍵時期，假如賴和前去的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北京，或許他的失落感不致這麼強。但是，他前往的是位處中國東南地區，軍閥勢力囂張，民眾醉生夢死的廈門（註二十）。雖經由雜誌報紙的閱讀得知，中國的文化狂飆運動正風起雲湧，但是，賴和無法直接感受到那樣的氛圍。在南方，他所看到的是奢靡的官紳，浮誇的民風，是豪賭、吸毒、狂歡、宴樂，過

註二十：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乃直、皖兩系對抗期，福建屬於皖系的勢力範圍。其間，駐防在粵東，統領二十營粵軍的陳迥明，曾在一九一八年五月進攻閩南，佔有漳州之地，賴和前去廈門約當此時。由於軍閥勢力的角逐，政局處在動蕩不安的狀況，當地土匪亦伺機為虐，民眾苦不堪言。參考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九九至三一三頁。

著紙醉金迷生活，罔顧窮民生命的上層社會人士。一九一八年所寫的〈廈門雜詠〉九首，以類似組詩的方式，用「分鏡」處理的技巧，來寫當時當地各種人物的面貌：在此地，唯有租界地是安寧的：「安危無責中華吏，秩序專須印度兵。風鶴不驚宵不警，笙歌唯此是昇平。」（之一.租界地），而屬於中華政權的管轄地卻是風鶴皆驚的：「萬家煙突幾家生，破屋斜陽戶不扃。零亂瓦磚餘劫火，流離骨肉感漂萍。數聲野哭雲沉黑，滿眼田荒草不青。匪患初安兵又到，一村雞犬永無寧。」（之二.鄉村）。何以匪亂屢生，致使骨肉漂零？鎮守此處的將校日日在歌舞場中對拳酣笑，除了憑空吹噓戰功以外，一事無成（之四.將校）。至於軍士，則沉迷於博戲，「卻從百姓抽來稅，孤注樗蒲一擲間」（之五.軍士），除了將人民辛苦的繳稅錢，拿來豪賭，何嘗真正保家，真正衛民？處理行政事務的官吏，除了對違法的民眾嚴施處罰之外，其它的政務皆拋到一邊（之六.文吏）；地方上的紳商呢？亦只知應酬交際，以打牌、飲酒，說官話、吟詩歌，與上層社會建立友好關心，以圖自己的利益。至於家國天下，就不是他願意去關心的了（之七.紳商）。在眾人皆濁之時，難道就沒有理性清明之人嗎？賴和把焦點放在年輕學子的身上，但學生恐也是光憑五分鐘熱度做事而已：「強敵耿耿迫四鄰，豈容吾輩作閒人？五分鐘熱休相笑，許國焉知更有身。」（之八.學生）。這樣令人失望的情況，難道是廈門獨有的嗎？在大陸期間，賴和曾到漳州、泉州、同安，所看到的景像無一樣能給他信心。在「白鹿洞」，他看到佛家清淨之地，卻有富人在此搭建洋樓，縱酒賭博（白鹿洞）；到「仙洞」則看到僧人媚世可鄙，全無修行者的莊嚴（仙洞）；在洪厝坪，他看到許多鄉人因無法繳交巨額的米糧供應軍需，遂紛紛離鄉遠去，只餘寥落十餘人家的荒村（由洪厝坪而龍鬚亭觀土橋）……最令賴和驚慌而不忍的是他在同安街上看到公然在市上為人注射嗎啡者：

人病猶可醫，國病不可醫。國病資仁人，施濟起垂危。今無醫國手，坐視罹瘡痍。禹域四百州，鴉片實離離。無賢愚不肖，嗜毒甘如飴。

沉痾去死近，惘惘誰復知。又嫌費吐吞，倩人注射之。受毒日以深，轉喜得便宜。四體針既遍，癥結成蛇皮。受者滋感悅，我淚滂沱垂。作甬而有後，天道益堪疑。（於同安見有結帳幙於市上為人注射瑪啡者趨之者更不斷）

何以中國人會此方式來解毒癮？是誰發明了這種慘不忍睹的方式，使上癮者四體結痂，宛如蛇皮？又是誰容許公然聚眾吸毒？這個社會是病了，這個國家是病了，而且，幾已無藥可醫了。賴和的悵然歸台，賴和的憤怒指陳，並非無因而然。這逐漸陸沉的神州，將一步一步陷入群魔亂舞的鬼域，而舉國昏迷之時，誰會是那個獨醒的人？一九一九年秋，賴和終於懷著強烈的無力感，以失望寥落的心情回到台灣。

3.台灣自主性的思考

殖民者不可憑，而遙遠的文化祖國也在心中逐漸遠去。作為台灣的知識份子理當認真省思，自己乃至整個台灣的定位何在？日本差別性的統治方針，將台灣人視為次等國民，在日本統治下，台灣人永遠矮了一截，永遠無法，也不願意成為道地的日本人；那麼，漢人的「原鄉」中國呢？它或許曾是許多台灣漢人的希望所在，然而，廈門之行，使賴和徹底地心冷了，一九一八年在寄林肖白的〈中秋寄在台諸舊識〉詩中他寫道：「莽莽神州看陸沉，縱無關繫亦傷心。迴天有志憐才小，填海無功抱怨深……」，漢族意識再也無法使他對中國產生強烈的認同了，賴和沉痛地指出自己在現實上與中國已是「無關繫」了。但是，基於漢民族的情感，他還是掛心，還是傷痛，還是很希望以區區之微，為中國盡一點心力，但，這是何等艱難又復龐大的重擔啊！誠如吳濁流所描述的，兩不著邊的「亞細亞的孤兒」，在那樣的時代實存在著何去何從的徬徨。此時，賴和早期所堅持的民族主義逐漸產生變化，雖然在當時未明確地提出台灣歸屬的問題，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作品隱約地掌握到他思考方式的轉

變。最足以用來說明賴和對台灣命運之看法的，當屬以下這兩首追懷當年台灣民主國的詩：

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怎不成。天與台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
(台灣通史十首之七.1920)

黃虎旗。此何時。閒掛壁上網蛛絲，彈痕戰血空陸離。不是盛名後難繼，
子孫蟄伏良堪悲。三十年間噤不語，忘有共和獨立時。先民走險空流血，
後人弔古徒有詩。黃龍破碎亦已久，風雲變幻那得知。仰首向天發長嘆。
堂堂日沒西山陞。(讀林子瑾黃虎旗詩.約1924)

不只是憑吊古事，賴和在這兩首詩裡其實已然提出了他對台灣未來走向的思考。「三十年間噤不語，忘有共和獨立時」，是一種何等沉痛的提醒。三十年來台灣民眾一直安於作為順服的日本次等國民，面對種種不平等待遇，唯有沉默以對。賴和在此提醒台人，難道已忘記當年先烈們為保家衛土而做的犧牲了嗎？那以血灌注的台灣建國史，那代表「台灣民主國」自主精神的黃虎旗，今尚栩栩如生，而島民都忘了當時先烈們的堅持和理想了嗎？考察賴和漢詩手稿可知，〈台灣通史十首之七〉原作：「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竟不成。天限台灣難獨立，古今歷歷證分明。」，這是在消極而又悲憤的心情下所寫的作品，對於台灣建國的未來並不抱希望，從台灣有史以來觀察，台灣追求獨立自主的理想何曾實現過？到了後來，賴和再度修改此詩(註二一)，將「國建共和竟不成」改為「國建共和怎不成」；將「天限台灣難獨立」改為「天與台灣原獨立」，不只是字句的修潤，亦非只是一、二文字的刪改，而是代表著賴和對台灣命運的嚴肅省思。如前所云：兩不著邊的孤兒是無所歸趨的，想要仰賴日本或中國來解救自己，有著事實上的不可能。因此，唯有落實

註二一：修改時間目前尚未能考訂，至於，有關對台灣自主性問題思考的改變，可參考林瑞明之說，同註二，二三頁。

本土，認同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以台灣為本位來思考，才可能找出自己的出路來。本土意識的抬頭不僅是賴和一個人的思考方式，其實也是當時台灣整個社會新思潮的取向。這是為甚麼三〇年代初，會有鄉土文學論戰的興起(註二二)，這也是為甚麼賴和會將許多取材自民間的東西納入文學作品中(註二三)。也因此，在回顧台灣歷史時，他往往能夠站在民眾的立場來觀察事情的始末。比如對於清時台灣三大民變之一「戴潮春事件」，賴和便能站在以人民為本位的立場，稱頌這位反抗政府的人中豪傑，而不以「叛賊」視之(註二四)：「戴潮春亦一時英，騫地干戈起不平。今日定軍山下路，冤魂夜夜竹根生。」(台灣通史十首之九，1920)；甚至日本領台二十年後，於一九一五年所爆發的慘烈殺戮——噍吧哖事件(西來庵事件)，對於參與其事者，賴和表面上雖亦沿用日本當局所稱的「土匪」，但是，對這些人以及這個事件，賴和卻有著極度的憐憫與同情。此可舉他的〈青年土匪一年十五一年十四噍吧哖事件之生存者立太子之典沐減刑恩赦見於台日紙上〉(約1922)詩為例說明之：

人性天賦與，所習長乃別。俗厚民自醇，地靈人斯傑。台灣瘴海中，穢氣所凝結。曾聞十年中，九度相喋血。絞台血濺未嘗乾，有人學甲復揭竿。可憐愚昧不知死，乃把肌骨試鐵彈。皇軍到處紛走死，屍填澗谷野朱殷。婦人縊於樹，背上猶繃子。死者伏其辜，存者難彼恕。盡法以警餘，庶幾禍患弭。二子十三四，亦繫縲絏裏。還想弄兵時，原當遊戲事。勞役幾年

註二二：參考游勝冠《台灣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東吳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一年六月，二二至二四頁。

註二三：如小說裡的〈善訟人的故事〉(1934)、〈富戶人的歷史〉(1934--1935)、漢詩裡的〈七星劍歌〉等皆屬之。

註二四：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此役稱為「戴潮春之亂」，而稱主事者為「戴逆」；然而，賴和對這位歷史人物卻有不同的評價。除在此詩稱之為一時之英豪外，在〈月琴的走唱〉亦云：「……曲哀心欲碎，調急耳頻傾。我厭陳三柏，人憐戴萬生。悠悠少兒女，隔世亦知名。」對戴氏的抗清失敗，有許多的惋惜。此詩後來經賴和老師洪以倫改為「仙侶梁山伯，賊豪戴萬生」，雖對仗頗工整，可惜其作意全失。

中，頗有遷善意。一朝沐減刑，知出阿誰賜。乳臭無知兩少年，法難輕宥天則憐。等待自由還復日，白頭猶或見青天。

此詩看似斥責青年土匪愚昧無知，以身試法，遂罹牢獄之災，而今幸逢朝廷聖明，才得恩赦，終有重見青天之時。事實上，這是賴和真正的意思嗎？首二句「人性天賦與，所習長乃別」，乃是強調這兩位青年本性善良質樸，那麼，是誰使他們蹈上人生的險境，使他們遭罹縲紲之災呢？賴和認為是後天的因素，是台民反抗成習，瘴海環繞，穢氣充斥，環境熏染有以致之。從清廷統治以來台人素以「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著稱，致使山河喋血，大地染赤。台人習性真是如此強悍不馴嗎？這其實皆就統治者的角度而言。反過來看，「十年九喋血」這樣激烈的反抗緣何而生？假如不是統治者無理的剝削和壓制，誰願輕易以生命作代價，做如是激烈的反撲？「可憐愚昧不知死，乃把肌骨試鐵彈。皇軍到處紛走死，屍填澗谷野朱殷。婦人縊於樹，背上猶繃子。死者伏其辜，存者難彼恕……」，賴和在此其實已將殖民者殘虐殺戮的史實暴露出來，日本軍所到之處，真是「殺戮到雞狗」（洪棄生詩），連婦女稚子亦不放過，遑論一般青壯？十四五歲青年挺身護衛家鄉難道錯了嗎？賴和以「反面著筆」的方式，站在民眾的立場寫出了一篇篇沾濡著血淚的台灣辛酸史，限於篇幅，在此不再列舉其它例子說明。

（二）始是人間一個人——自由、平等、理性、博愛的追求

如前所云，「二世文人」雖具舊學根基，但基本上接受的是日本教育，因此，能透過日文來接收世界思潮。十七、八世紀西方啟蒙運動的精神在於「理性主義」的覺醒。所謂「理性」是指：思考問題的理解力、認知概念的說明力、推求真象或真理的判斷力。在「理性」的總綱領之下，推衍出現代國家

的自覺，以及社會、民主自由的覺醒(註二五)。這一波以理性解釋人類一切活動的啓蒙運動，到了二十世紀，相當明顯地衝擊著東方的古老文明，尤其在西方霸權挾科技的強勢，稱雄世界之時，落後、衰頹的古老國家中的知識份子遂興起強烈的嚮往之情。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推翻帝制，乃至一九一九年展開的啓蒙救亡運動，莫不是在現實環境的逼壓下，尋求生存之道所做的努力。在那樣的一個時代，面臨倚附中、日皆不可靠的困境之下，台灣的先覺者要求知識階層快速地吸收西方思想的精華，為台灣的未來尋找出路的要求，實較之中、日兩國更為急切。

就日治時期的台灣思想界而言，賴和並非走在啓蒙的最前端，以醫生為本業的他也不能算是活躍的政治運動者。但是，在文學層面而言，他的的確確是一位先行者、一位導師級的人物。他的新詩、小說、散文為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創闢出一個開闊的新天地；就傳統詩的寫作而言，賴和亦有其不可小覷之處。受過漢文紮實訓練的他，擁有不錯的漢詩寫作功力(註二六)；而在詩作思想的層面上，尤有過人之處。那麼，賴和漢詩的可取之處究竟何在？筆著認為最重要的是他能透過舊的形式來表達先前詩歌作品所未曾表現過的新思想：自由、平等、理性、博愛。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新」，並非字面上的引用新事物、新名詞，而是在對人生問題的思考方式、人生面向的觀察角度上，確有異於前人之處。

1.自由與平等

十九世紀西方自由主義者提出了「天賦人權」之說，主張人民自由、財產

註二五：參考成中英〈啓蒙運動中理性的角色〉收在《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聯經出版社，台北，一九八五年九月，二〇八至二一〇頁。

註二六：賴和曾於一九二二年應《台灣》徵詩〈劉銘傳〉獲第二名及第十三名，可見他的詩藝水準相當不錯；而他生前好友陳虛谷亦曾稱譽他的詩：「平生慣作性靈詩，珠玉連篇不費思。藝苑但聞誇小說，世間畢竟少真知。」對他的漢詩有極高的評價。

安全及民意控制政府等觀念。而所謂的「自由」應包括：言論的自由與結社的自由(註二七)，這在殖民地台灣恰是一大禁忌。緣此，賴和在作品裡每每大力呼籲人權與自由的重要。新詩〈代諸同志贈林呈祿先生〉裡，賴和便是以高聲吶喊的方式，提出了爭取天賦人權的要求，並呼籲有志之士共同為此理想目標而努力：

這二十世紀的新潮流/久已環繞著六大部州/誰不是----人各平等？/誰不是——人皆自由？

試問我兄弟們/享得著不？/背地裡拋棄了/天賦的人權/成日卻做那被人/驅策的馬和牛

誰也不是個人嗎？/怎忍蒙以奇羞？.....美麗島上經/散播了無限種子/自由的花平等的樹/專待我們熱血來/培養起

如牛似馬，隨人鞭策的痛苦常壓迫著賴和的心，在他的漢詩裡同樣可看到這樣的譬喻：

牛馬生涯經慣久，一聞平等轉添憂。此間建立平和柱，幾次人間碧血流。(漳州雜詠, 1918--1919)

世間久已無公理，民眾焉能倡利權。自愧虛生已卅載，空隨牛馬受鞍鞭(元日小集各賦書懷一首不拘體韻, 1923)

鬱鬱居常恐負名，祇緣羞作馬牛生。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吾人, 1924)

何以不用「籠中鳥」「池中魚」的意象，而經常選擇「牛馬」作為被殖民者的象徵？主要是牛馬被鞍輓強加其身，與魚鳥一樣都有不自由的哀傷；而更無奈

註二七：參考塞班(Sabine)《西洋政治思想史》，洞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台北，一六九頁。

的是，鳥在籠中猶可翱翔，魚在池裡尚得游泳，而馬牛則要備受鞭策之苦。這種「鞭策」是身體的受折磨，更是心靈的受鞭撻。如此形象化地將被殖民者身心所受的桎梏與創傷赤裸裸地呈現，實讓人感到難以承受的哀痛。我們來看賴和兩次入獄所寫的獄中詩，當可更明瞭這種心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賴和因「治警事件」入獄時，從囚繫台中銀水殿轉至台北監獄時，有詩寫道：

功唯疑重罪唯輕，敕法何曾喜得情？今日側身撓乳虎，模糊身世始分明。
(繫台北監獄.五之一.1923)

此詩一方面指出了日本當局用刑的苛酷及用心之陰狠，一方面則指出因為這個事件，他才真正清楚地了悟自己的被殖民身份。「模糊身世」，是的，在未衝犯禁忌時，會比較樂觀地以為有朝一日，台灣人可以爭取到與日本國民平等的權益，而今，方始悟得自己真正的身份，方始悟得「日台融合」不過是殖民者欺瞞的謊言，甚至因此明確地知道日本所謂的「法」，根本缺乏其公正性。緣此，賴和在一九二三年有四首情緒激動的〈書憤〉詩，強烈地表達了心中的不滿，茲摘錄其中兩首如下：

一身毀與謗相兼，且避瓜田自遠嫌。無識可憐民間弱，恃權久失法尊嚴。
非罪罪猶罹公治，殺人人竟信曾參。料應此事難忘了，留作他年酒後談。
(四之二)

淤塞溝渠積水腐，人間何意唱尊古。利名一世喪貪夫，仁義千秋誤尼父。
老而不死是為賊，犢甫能行豈怕虎。縱然血膏橫暴吻，勝似長年鞭策苦。
(四之三)

原來「法」的尊嚴在殖民地是談不上的，日本當局往往可以不依一定的原則來裁量，而將台人羅織入罪。我們看賴和小說〈一桿稱仔〉裡的秦得參，原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善良百姓，竟因警察揩油不成而被折斷稱仔，且硬扣上違反度量衡法的罪名，被監禁三天。在現實的生活裡，賴和兩次入獄，尤其第二次(一

九四一年十二月)，更是「莫須有」的冤獄。在那「是非久已顛倒置」的時代，要如何才能為同胞爭取是非公理呢？恐怕須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前仆後繼，不斷奮勇抗爭，或許透過前人的流血、流汗，台灣人終有免於鞭策之苦的一天吧！所謂的「滿腔熱血吾無吝，付與人間換自由」（李君兆惠同黃張二君來訪因留住勸之以酒書以言志，約1924）即是這種烈士精神的寫照。但是，終賴和一生，這個願望還是沒有實現的機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莫名所以地再度入獄，晚年的賴和身體欠佳、萬慮纏心（註二八），在獄中對於自由的渴望更加的強烈，對無理橫暴的殖民者雖有不滿，卻礙於思想禁制無法予以激烈的抨擊，只好以私密的獄中日記與獄中詩，來表達他的痛苦。我們來看他的〈只因〉一首：

只因不說話，又再被拘留。口舌生來短，心胸滿是愁。臨機無應變，貽誤欲誰尤。不耐為囚苦，何日得自由？

因為被詢問起與在香港奉命籌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對台灣進行工作的翁俊明之間的關係時（註二九），賴和啞口無可應；要他說出平日對政府所抱的不滿不平，亦說不出口。絕望的賴和又被留置監牢，繼續漫無止盡的等待，這種焦灼不安的煎熬和折騰，當是埋下賴和以心病致命的主要原因。

除了在詩中表達對「自由」的渴望，另一個極重要的主題即對「平等」的追求，所謂「平等」在賴和筆下包括：種族之間、階級之間、官民之間的公平對待。〈送林獻堂先生之東京〉詩云：「生才自古原非易，作事如今大覺難。願與同胞齊奮起，悉教異族得相安。」（1920）又〈環翠樓送別〉所吟的：「日

註二八：賴和在入獄第十七天的日記中寫道：「……我的心真是暗了，幾次眼淚總要奪眶而出，想起二十年前的治警法當時，沒有怎樣萎靡悲觀，是不是年歲的關係，也（或）是因為家事擔負的關係？」，收在 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1.賴和先生全集》，一九七九年三月，明潭出版社，台北，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註二九：參考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收在氏著《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同註五，一八至一九頁。章君毅、翁倩玉合著《翁俊明傳》，中央日報出版社，台北，一九九〇年二月，台北。

台差別吟中撤，汝我猜疑飲次消。肆口未聞清虜罵，闊肩（原註：日人指人驕矜之態曰：闊肩）不似國民驕」即是強調日台之間不應有「統治者/被統治者」的矛盾對立，更不宜互相猜忌謾罵；彼此相安共處，才是一條可長可久的坦途。然而，驗諸事實，這恐怕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至於另一個亟待突破的問題則是階級之間的不平等：「人自甕中無米粒，屠門大嚼興偏豪。」（郊外）、「生者勞勞死寂滅，豪門酒肉貧民血。」（飲酒），這種情境頗類似杜甫所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尤其是「豪門酒肉貧民血」，不只指出貧富處境的懸殊，更將兩者的關係巧妙地結合起來。豪門縱飲的美酒自何而來？實皆貧民血淚灌注而成，這畫面令人讀了不忍而且驚心！〈戲作〉一詩則以說理的方式表達了他對社會勞力負擔及資源分配的看法，一定程度地表現了他社會主義思想的色彩：「社會原須共擔負，各人食力最應該。四民雖說無差等，也覺為官頂不才。」（約 1923）假如士農工商都能不分階級，共同為社會投注最大的努力固然好，（雖然這有事實上的不可能），但是仍會有一更高的獲利者，虎視眈眈地逼視著四民百姓，那便是握有「權力」的執政者。日本官員以殖民者的身份居高凌下，可憐的台灣工農，除了要受地主的勞力及財物剝削外，更大的災害是來自官方的欺凌。在資本主義與殖民政策的雙重迫害下，台灣百姓實在是苦難申。賴和有〈人生〉詩云：「日作四小時，人類飽暖矣。乃有怠墮者，強人以義務。豪奢不及物，取掠遂其富……欲遂生之樂，必自無官始。」（1924）這種主張有一點「無政府主義」的色彩。根據台灣無政府者的觀點：只要有國家便有權力，只要有權力便會產生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矛盾對立，這是受壓迫民眾痛苦的來源。因此，為了人類的自由與平等、社會的正義與光明，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取消一切不自然的私有制度，消滅一切強權，甚至付諸暴力亦在所不惜（註三十）。賴和此詩與無政府主義者觀

註三十：參考一九二四年台灣在北京設立的無政府組織「新台灣安社」及一九二六台灣無政府組織黑色青年聯盟的成立宣言，收在王乃信等人所譯的《台灣社會運動史》第四冊〈無政府主義運動〉之部，創造社，台北，一九八九年六月，六至九頁、十七至十八頁。

點極相似之處就在於：他們皆認為唯有國家制度、官僚組織的取消，才可能進一步談人權的自由和人際的平等，故在〈送林獻堂之東京〉的詩裡賴和又云：「破除階級思平等，掙脫強權始自由。欲替同胞謀幸福，也應悟到死方休。」（約 1920）強調了追求自由平等，掙脫日本強權統治，一生一世永不斷絕的心願。

2. 破除迷信

生性謙沖的賴和，重視人權平等，關懷弱勢族群，沒有一般知識份子的驕矜之氣；再加上身為醫生，常有機會接近社會群眾，所以他相當熟悉民眾的語言，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感，而這些經驗也常入到賴和筆下成為寫作的素材（詳後）。值得注意的是，賴和能掌握民間文化的精彩之處，也能夠盡力地予以摹仿、闡揚；一方面他又能看出其中較負面的東西，尤其是非理性的徵逐風水地理、神明信仰，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這都要努力加以破除。誠如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台灣民報》社論〈宜速破迷信的陋風〉所說：

近年迷信的毒害，算是蔓延到全島了。以迎城隍、媽祖、王爺的名目，舉行種種賽會，若綜計浪費，每年中實有數千萬圓之額，都是「無端乞福」，和「災後禳禍」二事而已。

該文認為，迷信之所以產生，原因之一在於民智未開，故賴和〈申酉歲晚書懷〉有云：「願把寸心酬造物，別探真理倡無神」（1921），唯有知識份子願致力於真理之宣揚、大眾的啟蒙，始可能讓昏昧的民智導向理性的清明。民眾崇祀神明幾至瘋狂的狀況，在賴和的漢詩〈迎媽祖〉（1922）與小說〈鬥鬧熱〉（1926）曾做了一定程度的呈現。賴和的成名之作〈鬥鬧熱〉，寫的是「三月瘋媽祖」的景況，南瑤宮確是彰化地區相當重要的神明信仰。三月媽祖生之時，這種神明廟會活動，規模之大，次數之多，其實是相當傷本傷神的。前所援引一九二五年六月《台灣民報》社論〈宜速破迷信的陋風〉裡尚有一觀點值得注

意：撰稿者認為民眾迷信雖不足取，卻又可憫；但是，仍有地方有力士紳，雖接受新教育的啓迪，卻「偏偏極力傳播能使多數人損失無數金錢，陷於不可救藥的迷信」，其故何在？「這是他們想傲倖取利，要奪他地方的利益，以顧本地方的繁榮」，因為本地方的繁榮乃這些士紳真正利益所在。〈鬥鬧熱〉裡，努力促成對立的雙方在神明活動中不惜耗費大量金錢比鬥的市長、郡長，即屬這類損人利己的上層社會人士。其實，先前賴和在漢詩作品〈迎媽祖〉的系列詩作中，就曾提出這個現象：

滿街繚繞紫檀香，萬燭輝輝夾路光。聽說神輿將入市，一時賺得萬人狂。(迎媽祖.之二)

茫茫天道尚難憑，泥塑木雕詎有靈。鼓舞大多街長力，繁榮策此亦堪矜。(迎媽祖.之三)

賴和一方面質疑泥塑木雕神明果真有靈否？一方面則批評具有智識的士紳街長竟大力鼓吹，讓物資本已窘迫的民眾為爭面子、為表示對神明的崇敬，不惜花費巨資來參與，而且幾近瘋狂，這種作為實愚不可及。賴和和同時代的有志之士關懷社會思想落後的一片婆心，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上述《台灣民報》的文章來加以印證，由此可見當時擔任啓蒙角色的社會精英對革除迷信的急切心理：

我們同胞若不想和他民族立在平等的地位，就無語可說。若是有志氣，想要對世界文化貢獻些兒，打破這種的陋風，真是刻不容緩啊！我們同胞快自覺吧！

另外，賴和有漢詩〈七星墜地歌〉則從迷信地理風水的角度切入，以億萬年前，天上有七顆星隕落人間，落石處，具龍氣，遂成佳穴的傳聞入筆。而後，在第二首寫道，曾座落在此佳穴的玄天上帝和有應公廟，卻不見得因此而香火永續，可見風水之說不可信：

玄天上帝神通大，啞巴乩童能說話。赫赫香煙盛一時，今日神龕蜘蛛網。

有求必應萬善同，骨骸曝露青燐化。得穴神明也如此，地理蔭人能信嗎？

(之二)

第三首則以亦居此穴的癩哥廟為敘述對象，聽聞癩人前去廟前井水洗浴，可去除皮膚病。但是，果真有效嗎？賴和在末二句以具體的形象「今日井水尚沸泡，癩人市上猶徜徉。」作結，來解破這個神話。最後一首，以販豬人客死，葬於此處為例說明，即使真埋佳穴，得以庇蔭後人又如何？富貴顯達的後人，因懼怕癩者發瞋，因此三兩次偷偷前來祭拜，之後來甘脆就不來了。到頭來，癩者散去了，兒孫也不見蹤跡了，空留佳穴又有何用？賴和在此詩中，不但意欲破除一般民眾有關地理風水、神明靈驗的迷思，更要指出人心的善變、世情的冷暖。既然如此，又何必苦苦去追求這些不可把握、無可保障的東西呢？

3. 人道主義的流露

「但願世間無疾病，不愁餓死老醫生」（壬戌元旦試筆.1922），賴和的仁醫形像一向為人所敬重，從民眾以「彰化媽祖婆」來稱譽他這個事實，即可明白他的仁厚性格。賴和的新舊文學也都在這種「不忍人之情」的思想基礎上，屢屢表現對弱者的矜憫，這弱者指婦、幼、勞農，也指長年以來受漢人壓迫，瘖啞無聲的原住民。由於前三者的相關論述較多，筆者在此只擬集中在「對原住民的關懷」這個角度來說明。

根據對賴和極熟悉的彰化作家李篤恭的口述，他曾親眼看到賴和如何對待從埔里步行前來就醫的原住民婦女，如何因矜憫她體弱路遙，而配了一大包藥，甚至提供車資，要求她必須從台中坐車回埔里，不宜再長途跋涉，致使病勢加深（註三一）。賴和是相當難得能將關懷的對象照顧到最弱勢的原住民身上的一位台灣作家。據李篤恭的回憶，賴和家裡不許用「番」字來稱呼原住

註三一：參考台灣文學家紀事系列二——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影帶中的訪談錄影，黃明川電影社製作，前衛出版社發行，台北。

民；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發表的散文〈忘不了的過年〉中賴和稱原住民為「住在山內的那些我們的地主」；一九三四年在他採自民間素材而寫的小說〈善訟人的故事〉裡，正義凜然，勇於對抗豪富地主的林先生「聽說是番社庄人，是不是生番的後裔，現在沒人曉得，但是他的性質卻率直果敢」，在那個漢人沙文主義充斥的時代，賴和能對原住民持有如此正面肯定的態度，這種胸襟氣度實非常人所能及。緣此，當他看到原住民在台灣受到多重的壓迫——日本統治者、資本家、台灣漢人的層層剝削時，濃厚的人道主義使他寫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最爲人所稱道的是他一九三一年四月發表在《台灣民報》為「霧社事件」（註三二）而寫的長詩〈南國哀歌〉（註三三）：「……兄弟們到這樣時候/還有我們生的樂趣？/生的糧食儘管豐富，/容得我們自由獵取？/已闢農場已築家室/容得我們耕作種居住/刀槍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現在我們有取得的自由無？/勞動總說是神聖之事/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這種感同身受的傷痛使得賴和在全詩最後一段以沸騰的情緒呼籲：「兄弟們來！來！/捨此一身和他一拼！/我們處在這樣環境/只是偷生有甚麼路用？/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也須為著子孫鬥爭！」霧社事件是賴和關懷原住民遭遇情感最激憤的一首，事實上賴和在二〇年代的漢詩裡，就已經看到他對原住民命運抱不平的態度，當時的作品主要是針對漢人欺壓原住民而發的。比如一九二二年左右的手稿中，可看到他往遊日月潭時曾向當地的原住民（邵族）採錄了歌謠，而後將之做了漢譯。所採錄的歌曲曲意，乃蒼涼地憶述漢人對原住民的掠奪：

註三二：霧社事件發生於一九三〇年十月廿七日，霧社泰雅族馬赫坡社因不堪長期忍受日人凌虐，在其頭目莫那魯道領導之下，利用日本公學校舉行運動會的機會，殺了一百三十六名日本人。此舉引起日方震怒，遂發動大批人力，使用新式武器，甚至國際禁用的毒氣，來殲滅竄入深山中的泰雅人，此戰持續兩個月之久，泰雅民眾死亡數多達五、六百人。參考溫吉編《台灣蕃政志》，台灣省文獻會出版，台中，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註三三：此詩分上下刊在《台灣新民報》三六一、三六二號，下篇的後半段被日本當局「開天窗」，變成一片空白，本文所引者在當時是被禁止刊登的，茲參考李南衡先生編的《賴和先生全集》，同註二八，一八一至一八三頁。

.....前面裡 我們祖先尚留得
 好空闊-- 茸茸細草清水平陂
 哀--哀-- 勿怨奔波！
 那-- 縛去園裡養的豬 刈奪田上熟的禾
 說是天佑的優勝者
 唉！ 他漢人們也自賢豪

值得注意的是這首作品最後，賴和所做的說明：「蕃人每歌此曲，多飲泣流淚。統治者恐其怨念莫釋，已不許其演歌。同舟有更在，不能強之盡曲，且意味亦不明瞭，只由一端而演繹之，非本歌之意。」換句話說，賴和所採錄的只是蕃曲之片斷，所轉譯者亦不能完全當符該曲之義涵。而原住民每歌此曲，所表現的傷痛，所謂「飲泣流淚」，其背後究竟有多少漢人欺壓的辛酸史？實難言喻。在此，除了看到漢人的強勢欺凌外，亦可注意到日本當局禁制尺度之嚴苛。歌曲謠諺，本最足以抒發民眾內心的感受，是人民情感的直截反映，而日本當局竟因曲過哀悽，恐其「怨念莫釋」而禁止歌唱，那麼原住民還有其它可以抒吐的管道嗎？在二〇年代初期的日月潭之旅，賴和除了採錄蕃曲，又貼近原住民的心靈，寫了一首長篇的〈石印化番〉(約 1922)，同情原住民的坎坷遭遇，並批判入侵番地的漢人之貪婪殘酷：

蕃人無曆史不傳，一事曾聞傳祖先。追逐白鹿忘近遠，遂來浩蕩潭水邊。
 渴有可飲飢有食，清泉甘冽魚肥鮮。天留此土養吾輩，移家不嫌地僻偏。
 竊喜紅塵得斷絕，昏昏悶悶長守拙。聚族歌哭恆於斯，不愁世上亂離別。
 世外桃源古徑通，桃花消息人間泄。漢民冒險入山深，澄潭始染競爭血。
 伏屍共痛殺傷多，埋石誓天暫講和。漁獵分區不相擾，佳時載酒或相過。
 猜忌漸忘情誼厚，共存始覺利尤多。鹽麋鹿脯互交易，浸潤能教蠻性革。
 語言不作舊啁啾，嘉會已解聯裙屐。飾胸黥面風尚存，殺人識首冤早釋。
 漢人肆詐漸欺凌，求活終年苦力役。社中婦女姿態佳，下山多作漢人妻。

至今壯夫無配偶，丁口減失生率低。散亡相繼年蕭索，夜中冷落牛驚嘶。
相杵歌殘明月下，含情禁淚心楚淒。誰知我亦天孫裔，（蕃人言語多有同於日本，
謂其先必同種每以自誇。）未甘長作漢人隸。牛馬生涯三百年，也應有會風雲際。
境過循環還到君，今日蕃人更得勢。直率初無報服心，與君協力永共濟。

入墾之初，這原是一處「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寧靜的桃花源。漢人冒險入山來之初，雖曾有過衝突，但因死傷過於慘重，雙方遂決定和平共處。但是，等到原住民逐漸漢化，武力不似往昔強大時，狡詐的漢人便又來欺凌善良質樸的原住民。他們掠奪了生產的資源，逼迫男性為他做苦力；誘騙女性，使她們遠嫁離鄉。留在故鄉的壯丁，找不到婚配的對象，使得村裡人口愈來愈少，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了。此詩從「誰知」一段以後，轉為第一人稱的敘述口吻，敘述者乃站在原住民的立場來發言：「誰知我亦天孫裔，未甘長作漢人隸。牛馬生涯三百年，也應有會風雲際。」較之漢人的苦難，原住民所受的滄桑更是一言難盡，距今七〇多年前的日治時期，當漢人還在為自己的存在尊嚴奮鬥，為自己的不平等遭遇喊屈時，賴和已能著眼於比漢人更受輕視、更被欺壓的原住民，而為他們的遭遇抱不平，實是相當難能又復可貴。

三、賴和漢詩的寫作特色

（一）新題與新想

如前所云，賴和漢詩每具「新意」，所謂「新」並非只是就新名詞的引入而言，而是能在新名詞中表現出異於前人的新思想，具有濃厚的啟蒙精神。但，在此處還是先從題材與題目看起。賴和漢詩裡，可以看到許多以前罕為台灣漢詩人所照顧到的材料：相當具有趣味。單從題目來看：〈看入學成績單〉、〈實習竹枝詞〉、〈月琴的走唱〉、〈台北各工場報曉水螺之聲正在校

起床時刻今復聽之萬感叢生>、<自由花>、<哀聞賣油炸檜的>、<讀太戈爾詩集竊其微意以成數首明火執仗之盜人固不奈他何>……皆頗具特色。

寫於一〇年代的<看入學成績單>與<實習竹枝詞>是由一位受西式教育的醫學校學生的生命經驗壓縮而來的作品。<看入學成績單>詩題雖新，但從內容上來看，則與早期的「看榜詩」無甚差異；倒是<實習竹枝詞>的內容頗為新鮮：

問汝而今年幾許，從來生業賴何如。底事雖為二豎欺，有甚原因休汝隱。
細將苦痛訴余知，身中猶存潮寒熱。胃口能無苦渴飢，此病到今經幾日。
可曾服藥可曾醫，幾番打診兼聽診。不辨清音或濁音，更還按脈別浮沉。
斷作癆傷疑未穩，欲言寒熱病方深。

賴和以實習醫生的口吻，透過提問的方式，從病者的年齡、職業、遭遇的痛苦、心中的感受，病勢如何？就診情況如何？並以醫療中的「望、聞、問、切」來判斷患者可能有的病因。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年輕、充滿愛心而又認真的實習醫生之形貌，極為親切也極生動逼真。以醫療經驗入詩，在台灣漢詩作品中賴和恐是第一人(註三四)。

至於<台北各工場報曉水螺之聲正在校起床時刻今復聽之萬感叢生>(1918)則又呈現了二〇年代甫邁向工業社會時，台灣人生活的作息樣態。據呂紹理(註三五)的研究「水螺是中南部農民對糖廠上下工汽笛訊號聲的稱呼。它雖只是一種時間訊號，但，這訊號卻標示著一種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代表一種新的社會生活作息規律登場。」因此，水螺響起代表台灣已從傳統農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社會，逐漸進入到重視時間、講究效率的工業社會了。從此，人們不能再如往昔般悠閒度日，時間被精準地切割，預示著科技主

註三四：參考前衛出版社發行的影帶<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林瑞明的說法，同註三一。

註三五：參考呂紹理《水螺響起一日據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遠流出版社，台北，一九九八年三月，II頁。

導的時代將要來臨。賴和在漢詩裡遂將這種新事物與新現象引到作品中來，他回想到三年前就讀台北醫校時，聞水螺響聲，學生都必須及時起床梳洗，靜候前來檢查的先生，那種異於傳統農業社會，要求速度的緊張感，一直到他畢業後都還深藏在意識深處，久久未能消去。這詩雖然簡短，卻能把殖民地台灣逐漸由舊社會進入新時代，對時間感的改變具體地呈現出來。

寫於一九一九年左右的〈自由花〉算是所有作品中最具新思想特色者，此詩雖以漢詩的形式來書寫，其實朗讀起來，它更像一首接近口語的白話詩：

自由花蕊正萌芽，風要扶持樹要遮。好共西方平等樹，放開世界大光華。

這詩雖嫌直接，但是，在那世界思潮強力激蕩的時代，要宛轉凝鍊地表現新的觀念和思想，恐非易事。因此，倡導新思想的方式往往是噴薄而出的，是直接而不假修飾的。在詩中賴和以充滿韻律和節奏感的文字，直接揭示「自由與平等」思想之來源以及它在當時蓬勃興發的情況，並明確地指出這兩者乃當時民眾致力追尋的極重要目標，在前面章節所引的賴和詩，其實有不少作品皆是扣住這個主題而發揮的。

至於〈哀聞賣油炸檜的〉（註三六）以清晨賣油炸檜的小兒作為關懷對象，亦是一新題材。「油炸檜」是台灣人早餐常見之食物，至於，小兒遭到「大人」刁難之處「派出所」，則是日治時警察局的代稱，這種具時代特色的用詞，鑲嵌在作品中，使得字裡行間充斥了異於傳統漢詩的特異情調。但，此詩的可取之處主要還是在對「警官大人」的批評。因賣聲間作，擾他清夢之故，惱怒的警察便祭起「法律」的大旗，雖小兒苦苦哀求，卻絲毫不為所動，所謂「法在情難恕，絮絮將何為？」那麼，這小孩究竟犯了甚麼法呢？對日治時期法律客觀性的質疑，常出現在當時新文學作家的作品中。比如賴和〈一桿秤

註三六：賴和手稿原作此題，後來林瑞明編的《賴和漢詩初編》則作〈哀聞賣油炸檜者〉，可能是根據賴和修改後的抄本而編錄，筆者尚未得見該手稿。

仔>的秦得參被誣以觸犯「度量衡法」、楊守愚<決裂>裡的朱榮，被指為違反「治安警察法」、呂赫若<牛車>裡的楊添財，則是違反了「道路管理法」……文化鬥士之一黃呈聰在<法律的社會化>(註三七)一文中說到：「法律的理想就是要實現正義及維持公平，並增進社會人類的實生活啦！」然而，這些原應具有客觀性、公正性的「法」何以走了樣呢？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日本將台灣特殊化，並未施行與日本本國同樣的法律。在一八九六年發佈統治台灣的法律主要是「六三法」，這法條賦予台灣總督具有發佈具法律效力之命令的特權，後來雖有「三一法」的修訂(註三八)，但是其本質卻是一樣的。針對台灣的需要，總督可以訂定符合日本利益的命令，並用來壓制台灣人民，其目的便是為了方便控制台灣人民，並不曾真正照顧到台民的基本人權。更可怕的是與人民關係密切的警察，便是執行法令的人，為了個人的私利，警察往往無限制地膨脹自己的權力，對百姓施以壓力，使民眾苦不堪言。台灣文化協會歷經十餘載持續地努力爭取台灣議會的設置，其目的就是希望取消惡法，爭取台灣人在政治上的發言權，建立一個真正有法治的社會。賴和此詩中的警察形象雖不像他小說作品(<一桿稱仔>、<不如意的過年>、<惹事>)般具體明顯，所施行的刑罰也非最嚴厲者，但，仍可因此引發讀者對日治時期不合理警察制度的思考。

其次，<讀太戈爾詩集竊其微意以成數首明火執仗之盜人固不奈他何>(1924)四首亦是頗具特色的作品。透過對泰戈爾《漂鳥集》的閱讀，探其微意，而後再將之扣到自己的身世遭遇上來，借著台、印兩地智者的心靈對話，開展出具有深意的思想內容來，茲舉這組作品中的第三首為例說明之：

被侮辱人勝利基，殷勤歷史等為書。群星曾被流螢笑，宇宙終生小犬疑。

工作自知多野質，文章亦愧本空虛。宵來猶有明燈在，失落斜陽不用悲。

註三七：黃呈聰此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發表在《台灣民報》。

註三八：參考葉榮鐘《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同註3，六〇頁。

筆者認為，這首詩的前四句是壓縮泰氏幾首詩的精要而來，接著賴和在後四句裡才提出他自己對人生的幾個看法；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針對日本人，即題目所謂「明火執仗之盜」來發言。以下先將泰戈爾的相關詩作呈現如下：

△人類的歷史很忍耐地在等待著被侮辱者的勝利。(漂鳥集.三一六)

△螢火對星星說道：「學者說你的光明，總有一天會消滅的。」天上的星不回答。(同上.三三)

△小狗疑心大宇宙陰謀竄奪牠的位置。(同上.一九〇)

被侮者雖一時受辱，但他終將能在長時間的歷史考驗下成就了他的勝利。這不正是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心聲嗎？只要忍耐，經過時間的累積，強權統治者終將崩潰瓦解。至於螢火與星星之喻，很容易讓人想起浮躁淺視者往往譏誚沉著安靜者；這用中國古代的例子來說就是「燕雀」與「鴻鵠」的不同。而胸襟褊窄、唯利是圖者往往容易對人產生猜忌，尤其是溫厚良善之人，這不禁令人又想起中國先賢莊子的鵷鶡與鳳凰的對照。同處於被殖民命運的困境，印度哲人所提出的人生觀察，其實和賴和的感受十分相近。詩的後四句，則是賴和的自抒懷抱。他首先自云在世文章、事業兩皆無成，末兩句則翻轉出隱忍之後的無限韌力：「宵來猶有明燈在，失落斜陽不用悲。」莫因日落而哀傷絕望，這世界儘管未能盡如人意，卻也不會是全然的黑暗。太陽雖然落下，還是會有明燈為我們指引生命的方向，給人帶來生命的希望。在此，可用泰戈爾的另一首小詩來與之印證：「太陽在西方落下時，它的早晨的東方已靜悄悄地站在它面前。」(漂鳥集.二〇五)台印兩智者對生命的省思，以及面對挫折時所呈現的韌度，都給予我們極好的啟發。

(二)走到民間

「心情俗化久無詩，墮落雖深卻不悲。要向民間親走去，街頭日作走

方醫。」(十日春霖)，賴和的祖父以弄鉞起家，父親又是道士，都和民間有密切的關係；加上賴和謙和平易的性格，使他自小就與民間有著一體感(註三九)。一九一九年左右，他有一首〈郊行雜詩〉云：「見識無多身份輕，不才有負做醫生。葛衣草帽閒行腳，到處兒同喚小名。」可見他是如何走到民間，與民眾打成一片；因此，對於民間的東西，他相當看重而珍惜。他在一九二四年左右所寫的一篇文章〈開頭我們要明瞭地聲明〉(註四十)裡，強調了民間俚諺歌謠的重要：

舊文學自有她不可沒的價值，不因提倡新文學就被淘汰……新文學的藝術價值因其有普遍性愈見得偉大，亦愈要著精神和熱血，所以敢說有思想的俚謠、有意態的四季春、有情思的採茶歌，其文學價值不在典雅深雋的詩歌之下…

由於力倡新文學之故，一九二五年以後賴和似乎就比較罕作文人雅士慣作的吟詠詩了；但，這又何妨？他不怕「俗化」，所謂「俗化」就是去掉士子驕矜倨傲的習氣，而走向「大眾化」的意思。要走向民間，要和民眾打成一片，才能真正感知民眾呼吸的脈息，才能真正去聆聽民眾的痛苦呻吟或歡樂的歌唱。因為本著這樣的信念，賴和作品台語化的現象愈趨明顯；同時，對於民間文學的提倡、資料的採集，乃至於創作的模仿，都代表了他在民間文學方面努力的成果。至於，在漢詩方面，賴和同樣也是走著這樣的路向，皆嘗試從民間歌謠吸收新的經驗，以接近口語的方式傳達民眾的心聲。因此，他的漢詩有的直採竹枝詞的形式，如〈新竹枝歌〉、〈北港竹枝〉、〈實習竹枝詞〉等；有的則用民眾熟悉的語音朗讀，如〈西北雨〉、〈我心惻〉、〈農民嘆〉皆標注以「土俗

註三九：參考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收錄於《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文集》，同註五，三〇頁。

註四十：此文創作日期不詳，據李南衡先生推斷可能是新舊文學論戰時的作品，參考李南衡編《賴和全集》，同註二八，三五五至三五六頁。

音」念誦，目的就在於希望透過民眾稔熟的方式，成為他們的喉舌，說出屬於他們內心的感受。賴和另一方面的實驗是，寫下模仿民歌的作品：〈新樂府〉(1930)、〈農民謠〉(1931)、〈相思歌〉(1932)、〈呆囡子〉(1935)採用了以台語入詩的方式，生動而逼真地呈現了台人生活的面相。茲舉〈新樂府〉五首中的兩首為例，可見賴和作品裡濃厚的民間性格(註四一)：

米粟(米穀)糶無價，青採有歹賣價(難賣)。飼豬了(虧)本錢，雞鴨少人買。

賺喰(謀生)非快活(容易)，種作總艱計。官廳督促緊，納稅又借債。(之一)

街頭有小販，賺喰真可憐。一見警察官，奔走各紛然。行商如做賊，拿著(抓到)便要罰。小可講情理，手括再腳蹠。(之二)

賴和出身民間，醫學校畢業後雖然也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但是，基本上他還是以基層醫生的身份在彰化行醫。終其一生，他皆努力不懈地走入群眾，傾聽民間的聲音，甚至能夠虛心地向民間學習，為民眾創作文學的立場，一直到他病逝為止，皆不曾改變(註四二)。這種濃厚的民間性格，從上面所舉的例子，當可獲得一定程度的證明。

(三)新舊文學的互滲互補

研究日治作家常因篇幅或其它因素的限制，將新舊文學分開來討論。當然，新舊文學各有其特色，某些論題還是必須分開來談。但是，對部分作家，尤其是跨越新舊文學的作家而言，新舊文學作品的研究還是不宜截然切割來看。吾人若翻看賴和的詩作手稿，可以發覺在賴和觀念裡，新舊體詩的創作其實不是斷然二分的。誠如他在〈論詩〉一首所云：

國風雅頌篇，大率皆言志。所貴在天真，詞華乃其次。嘲笑及萬物，刻劃半遊

註四一：有關賴和作品中的俗文學作品之特色，請參考陳萬益、薛順雄兩先生之論文，參考同註六。

註四二：參考陳萬益，同註六，一三四頁。

戲。未用嘔心肝，不妨閒擁鼻。有時還自來，求之轉不易。無病作呻吟，易滋人謗議。頌揚非本心，轉為斯文累。迫仄乾坤中，閒情堪託寄。鞭策牛馬身，此即自由地。多少嘆息聲，幾許傷心淚。主權尚在我，揮洒可無忌。門戶勿傍人，各須立一幟。梅花天地心，鳴鳳人間瑞。思想之結晶，文字為精粹。

這是表達賴和創作觀一首相當重要的作品，詩的好壞，不決定於是新詩還是舊詩，而在於是否出自內心的真誠；辭藻的修飾、技巧的安排反是次要的。他同時認為寫詩的靈感不可力強而致，因此，無病呻吟、矯揉造作的毛病應該擯除，尤其忌諱借詩來歌功頌德、諂求權貴，這是最墮落的行為。他又主張，寫詩勿依傍他人門戶，應自己心中有主，才能寫出具原創性的作品來。尤其身處殖民地，諸事皆受日本人限制，唯有寫作主權在我，最是自在！因此，若能透過文字，將自己思想的結晶呈現出來，才是最可貴的。

那麼，筆者所謂賴和的新舊文學能達到互滲互補的功能，其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觀察賴和作品可以發現，他有時候會以白話為題，內容卻是寫的舊詩，比如：〈死了的志煜兒〉(1918)、〈哀聞賣油炸檜的〉(1923)、〈月琴的走唱〉(1924)、〈月夜的街路〉(1924)都是白話文的題目。有時，賴和以文言為題，舊詩為內容，卻在詩題後的序文寫了一段白話文，比如：〈田園雜詩〉的序文云：「日前在民報上讀到江耕雨氏田園雜詩，覺得是近來少有的佳作。又偷其意學作幾首，但，效顰究竟是可笑的事，世間能認份自知醜陋，也是不易有的。」；又如〈醉人梓舍之哀詞〉，同樣在舊詩之前，有一篇白話的序文。有趣的是，他一九二一年在為日治時期台灣三大舊詩社之一台南「南社」寫十五週年祝詩時，竟是以白話詩的方式來傳達，在賀詩中強調了「詩」是心之所不容已的發露，是絕諸現實利益考量的：「我們做詩的亦是不衣會寒不食會飢／就是做苦來過日子也廢不了做詩／為甚麼呢？有的，愁嘆的聲、傷悲的淚、歡喜／的情、感憤的氣／一條鞭寄在裡頭去／況又是通聲氣同環境的人自然會聚攏／在一塊兒」，所以同聲相應的詩人，著重的是把「文化的精血」傾注在作品中，且能「實地裡做詩人生活去／使這無用的有用／教他不

知者共知 / 為我們做詩的吐些兒氣」，方始不辜負詩人作詩的一片苦心。在賀詩裡只看到賴和對詩作精神的闡發，對詩人心志的鼓舞，而並未加以區分這是新或舊文學。可見在二〇年代初期新舊文學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如此壁壘分明，賴和自如地遊走在新、舊文學兩個領域中，有自得之樂。從賴和手稿又可以看到一個問題，即：賴和常常會用新、舊不同的文體，來表達同一個問題、抒發同一種感受，吾人可自其中比較出不同文體面對同樣題材時，彼此的優點和可能產生的限制。比如一九二四年賴和曾至關子嶺遊玩，並寓居洗心館洗溫泉。當時，他有漢詩〈寓洗心館〉云：「骯髒身材病已深，神仙無術可砭針。暫離穢毒人間世，來視溫泉一洗心。」短短二十八字，寫出了他欲以溫泉自洗穢濁的用心。讀者可能會質疑，賴和何以用「骯髒身材」來自況？所謂「骯髒」究竟指甚麼而言？在他隨後不久所寫的白話詩〈感詩〉(1924)，就有了更清楚的說明：「我為甚麼 / 甘做那金錢奴隸 / 牛馬勞人 / 日日奔馳役使----跳不出----十毒世界 萬惡迷津 / 被那名韁利鎖 / 枯喪了生來的美德天真....」白話的「白」恰可以補足舊詩的某些不足，但，也因舊詩有許多事不明說，反而給讀者以更大的想像空間，事實上兩者之差異並不只此，兩者之優劣也不必從這裡分。賴和以不同文體表現同一題材的例子不在少數，比如〈補大人〉先後就用了舊詩與小說兩種文類來表現；〈送虛谷之大陸〉也同樣有新、舊詩兩種文體的作品；此外還有題為〈哀聞賣油炸檜的〉的舊詩及〈不幸之賣油炸檜的〉的小說，限於篇幅，這個問題可留待將來再討論。

四、結語

緣於被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漢詩的成就往往被忽略了；也緣於舊詩文自二〇年代以後，尤其是新舊文學論戰後，逐漸成為一種「逝去的文學」，因此，今人較罕回過頭來細看這些在台灣曾經留下豐碩成果的文學資產。

近年來，由於資料的出土，研究者關懷的角度逐漸放寬，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現象的研究，已不再像先前一面倒地偏向新文學。研究者開始注意到日治時期台灣的漢詩寫作，尤其是跨越新舊文學領域的創作者。在探究這個主題時，筆者最感興趣的是，跨越新舊文學的台灣作家經過新文學的淘洗、新思想的啓迪後，在創作傳統漢詩時究竟呈現了甚麼樣的特殊之處？

早期賴和漢詩表現的題材、寫作的手法與傳統文人比較相似，他喜歡單純地寫景抒情，寫落花、寫蕉影、寫孤燈寒月，讓我們看到了少年賴和小小的感傷、年少的清狂，以及對人情的萬千繫念(註四三)。作品雖偶有新異之處，但是，對人生的觀察與生命處境的思考仍不夠深刻。一九一八年的廈門之行，是他生命的一大轉折。現實生活的壓力，軍閥割據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漢民族許多根深蒂固的劣習……一一入到他眼中，使原本即具有人道精神的賴和內心激動不平，遂透過詩作逐一予以批評。緣此，他作品的視角更寬廣了，思考問題也更深刻了，對台灣主體性的思考，也逐漸在形成了。

一九一九年返台後，由於受到日本大正民主時期及中國五四新思想的刺激，加上殖民地知識份子對民族處境、人權問題的思考，賴和將關懷的觸角伸展到：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理性等問題的追求上。而這些努力也都可以從他的舊文學獲得印證。所以，閱讀賴和那些承載新思想的舊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文學現象逐漸過渡到另一個文學現象的階段性特色。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我們往往以一九二〇年作為台灣新舊文學的切割點，認為新文學從這年開始發軔，而以一九二四年新舊文學論戰作為二者判分優劣的分水嶺。從此，新文學以十足的優勢取代舊文學，而成為文壇的主流，至於舊文學似乎隨著一世文人的去世而逐漸地枯萎凋零。一世文人的逝世，誠然代表清朝科舉制度栽培下的傳統士紳逐漸地退出台灣文學的舞台，但舊文學的命脈並未中斷，位處於

註四三：比如他寫於一九〇八年的〈題扇詩〉、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左右寫的〈落花〉、〈偶興〉、〈晚晴〉、〈憶家〉、〈傷秋〉等作品，參考林瑞明編《賴和漢詩初編》，同註七，七頁、八頁、十頁、十二頁、十三頁。

「兩界」的「二世文人」依然能在新、舊交揉的文學環境裏，寫出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文學風貌來。

假如以嚴格的角度來苛責賴和等人，可能會覺得他們的舊詩不夠典雅細緻，而新詩也不夠精鍊、流暢。但是，假如沒有這個蛻變的過程，嶄新的生命何由形成？新文學的繁花盛景如何呈現？筆者認為賴和是台灣新文學蛻變過程中的第一人。這「第一」有「時間」上的「先」與「品質」上的「優」之義，與賴和同時代的二世文人中，寫作成就和他相比的恐怕寥寥無幾。楊守愚算是以漢文寫作新文學數量最多的一位，但是，他在漢詩的數量與品質上，顯然無法與賴和相比；而他之所以走上新文學之路，實緣於賴和大力拉拔之故。陳虛谷、周定山的漢詩數量與品質，未必遜於賴和；但是，在視野的開闊度及實驗性上，可能稍稍不及賴和；在新文學的創作成就上，更遠落於其後。吾人若能從這個層面來進行理解，或許更能適切地突顯出賴和漢詩在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及其價值。